

# 历史回忆

刘宗梁

回顾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仍心有余悸。既有悲惨的生活磨难，又有迫不得已的奋起抗争。往事历历在目，感慨万千。“文化大革命”也提供了一个人生大舞台，各种角色：生、旦、净、末、丑纷纷“亮相”，尽情表演。感于《西昌文史》第十五辑关于“去掉包袱，消除顾虑，尊重历史，教育后人”的征稿启事，仅就笔者在这个“历史舞台”既看戏，也参与演戏的部份场景回顾于后。

## 一、从批判他人到被批判

一九六六年夏，我任西昌专区水电局办公室主任，被抽调到月华电站工程指挥部任副指挥长，兼工程处副主任。专区水电局局长赵长庚同志兼月华副指挥长，工程处主任，还兼泸沽渠工程指挥长。当时，月华电站已建成，并试车成功。赵长庚同志转移到漫水湾，全力抓泸沽渠工程，留我在月华工地负责扫尾工作。北京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我“紧跟形势”，在工地组织学习，将两位技术干部和两位行政干部列为批判对象，组织大字报围攻，无限上纲或牵强附会，说他们四人是月华的“三家村”或同伙。学习和批判了十余天就搁置下来。六月，地委决定发电供电分开，西昌水电厂改称东河水电厂，搬东河办公，只管发电；新成立西昌供电所，专管供电，调我任所长；留任克秀同志任

月华电厂厂长，调西昌水电厂党总支副书记王永泰同志任月华电厂党支部书记。

回西昌后，被抽调到专区水电局搞“文化大革命”运动，批判一位副局长是水电局的“三家村”。红卫兵开始串联，批判被迫停下来。地委部署组建机关红卫兵。我向水电局机关红卫兵安排，按地委指示的统一口径，如有红卫兵来串联介入，以“请相信本单位群众能搞好本单位革命”婉言谢绝。不到半月，本单位革命群众组织陆续组建，官办红卫兵很快消失。我因长期未在本单位上班，运动初期“划类排队”，批斗“三、四类”都未参与，与职工群众没有深刻矛盾；生产秩序虽然日渐混乱，但尚能行使管理职权，也有人身自由。一九六七年初，成都军区召开全省工业生产会议，水电系统的供电所、月华电厂、东河电厂各选一名干部和一名工人代表参加会议，我有幸参加。会上分发和学习了空投的《中央军委致全国工人阶级的公开信》。会议的主题是要求工人阶级坚守岗位，努力搞好生产，稳定正常秩序。会完回西昌，社会秩序更加混乱，还未组织正式传达会议精神，即传来“反击二月逆流”的“革命风暴”，上海全面夺权，西昌也在两三天内夺了各单位党、政、财、文大权；刚抓进去几天的造反派也全部放出来了，生产和工作陷入瘫痪，连军代表说的话也不全听了。

月华电厂成立了造反组织，勒令我和王永泰、任克秀三人接受批判。开了几次批判会，贴了几十张大字报，我检查了批判月华“三家村”的错误，戴了“尖尖帽”，口衔稻草，其他尚无过激行动。

回西昌后我成为供电所的主要批斗对象，无休无止地批

判我是“二月镇反黑干将”，“黑后台”，逼我交出整造反派的  
黑材料。我反复申辩：1. 西昌抓造反派时我在成都开会；  
2. 供电所及两个电厂没有一名造反派被抓；3. 造反派已从  
公检法查抄了全部黑材料，其中没有我写的。据理申辩，丝毫  
无效。批斗逐步升级，戴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  
政治帽子。

从西南铁路工程指挥部（简称西工指）传来“打翻在  
地，再踏上一只脚”的“经验”，我们开始坐“喷气式飞  
机”，双手被倒背，越扭越高，低头达到九十度。每次批斗  
会，都由造反派从左右两边反扭双手，跪步上场，活象刽子  
手押解犯人上杀场的情景。至今双肩疼痛，双手不能反屈。

军代表是奉命来支持群众搞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  
但“支左”的提法就表示把群众分为左、右两派。在中央文  
革小组江青等人的挑拨煽动下，社会很快出现了两派，供电  
所也随之分裂为誓不两立的两派。两派都争“左”的桂冠，  
谁也不甘落为右派，磨擦不断，武斗升级。派性必然影响同  
样生活在社会上的军队，西昌形成两派驻军支左，各支一派  
压一派，我们夹在中间，日子更难过。双方为了表示自己革  
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都拿批斗走资派来表现自己，批斗频  
率越来越高，揭发材料越来越离奇，莫须有的罪名越来越  
多，调子越喊越高，“帽子”越戴越多越大。第三届军代表  
是军分区某连长，据说是军分区董正洪副司令员亲手培养提  
拔起来的。他在职工大会上鼓动说：“分区机关批斗董正洪，  
他不老实交代，我们搞了点武斗，虽然违反点政策，但他却  
乖乖地交代了。”经他这一示意，从此供电所的批斗会“革  
命”为全武、行的大打出手，我每次都被打得口鼻流血，小

便尿血；用重拳猛击颈部，达到弯腰九十度“请罪”，导致鼻子长期流淡血水；用细铁丝拴硬木板挂在颈上，还要加挂红砖，多数时间加到三匹，个别造反派用脚将砖尽量往下踩，跪瓦渣子，跪水泥墩，揪住领口反复按下去又提起来，意在使足膝在水泥墩的棱角上反复磨，磨破的伤口化脓流黄水，与裤管粘连一年多，至今伤痕仍在。

武斗升级，四一〇厂是一派武斗人员据点，小庙变电站与四一〇厂厂区相连，变电站值班人员在子弹呼啸声中坚持生产，一粒子弹洞穿了主变压器，子弹头掉进变压器里，变压器油从弹孔溢出。多数人员陆续撤离，剩下技术员蒋向东同志一人坚守。直到一天半夜，武斗队员“攻进”值班室他才被迫撤离。次日，一位老工人对我说：“小庙变电站空无一人，派你去看守”。我说“那里是武斗据点，枪声不断，我担不起这个责任”。他说“你是当权派，你不保护国家财产，谁去？”我只好不顾个人安危，同意去。但一家人都不放心，母亲、爱人、女儿都不便同去，只好由年仅 11 岁的儿子刘慰民陪我去。父子俩背床铺盖去变电站。机房、值班室和宿舍遍地都是血迹和伤员包扎伤口的棉花、纱布。床铺、桌凳、门窗都被砸坏和烧毁。父子俩铺一地铺住下来，四一〇厂留守的郑厂长借给一床棉絮，批条子叫我在厂食堂打饭。这个食堂当时已被武斗人员接管，物资很丰富，主副食品是武斗人员以“革命行动”搞来的，吃什么都有，也不给钱。我和四一〇厂几个留守人员都自觉买菜饭就餐。我们深知同流合污地“沾光”是会倒霉和后悔的，没有的事都不清，还敢惹腥吗！一位已回农村家中躲武斗的职工，骑自行车回变电站，关心地教导我：“若有武斗人员进变电站，

应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几种人’，留下看守厂房的。”我不由大怒，大声和他争吵起来：“我是哪‘几种人’，你拿出证据来！”他解释说：“我是为你好，免得他们打你。”我说：“打死也是共产党的干部。”其实，至今我都理解和感谢他的善良用心，但我更坚信“士可杀，不可侮”。这次武斗逐渐平息，我作主力，儿子助手，四一〇厂派来两名老电工协助，拆卸变压器，取出子弹头，焊补了弹孔，过滤变压器油，烘干变压器，恢复送电生产。值班人员陆续返厂，造反派命我撤回。

一九六八年冬，西昌供电所在机枪保护下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地革委批文军管代表任主任，（当时有军代表驻厂，不知什么缘故暂缺）原党委书记以革命领导干部身份结合为副主任，造反派头头一人结合为副主任，二人结合为委员。从此运动向前大迈了一步。原来是群众的革命运动，现在升级为革委会领导下的革命运动。立即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凭空诬蔑我是“国民党”、“特务”。除了勒令我交代这些“政治历史”问题外，还要交代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林副统帅”的“反革命罪行”。每次批斗会，我对十七年工作中的缺点进行诚恳地甚至违心地上纲上线检查，对所谓“政历”和“反党罪行”据实据理坚决否认，换来的是“顽固抵赖”的“罪上加罪”。“莫须有”虽不是他们的发明和独创，但却得到他们忠实的继承和发展。我头上增加了“顽固不化”、“死不悔改”两项政治帽子。革命领导干部威胁我“顽抗只有死路一条，”我说：“事实和历史会证明我的清白”，却又给我增加“准备秋后算帐”的“罪名”。有一天，突然出现一张耸人听闻的大字报，说我在银行取了存

款，准备逃跑。舆论开道，我被关进一间黑屋，窗户用木板钉死，蒙上黑布，室内无任何物件，二百瓦灯泡昼夜长明，门口有人轮流值守，除上厕所派人押送外，白天黑夜不准出房门一步。孩子给我送饭，母亲在碗底藏了两块猪肉，被造反派头头检查发现，把肉挑出甩了，又增加一条“反省期间还在享受资产阶级生活”的“罪名”。关押一两月后，似乎觉得太便宜了，改为劳动改造。休息时间关黑屋，工作时间劳动。扫院坝，扫厕所，给基建工地挑砖，“群众专政大军”派人轮流看押。有一次，打扫到厕所附近，母亲迅速端一碗糖开水给我，恰被造反派头头遇见，一脚将糖水碗踢翻在地，狠狠地给了我两耳光。这种劳动，延续了约一年时间。一九六九年，放我回家住宿，安排我烧了一年多的开水。在劳动和烧开水的这段时间，规定我和另外四名被批斗的干部每日三餐都要挂上黑牌，抱稻草人，敲锣在厂门口“请罪”，待全厂职工打饭后，我们才能进厂吃饭。敲锣“请罪”，也延续约一年时间。

在我反复向上申诉下，革委会也实在没有“钢鞭”材料，打也打不倒，放了又不情愿。一九七〇年七、八月，革命领导干部与我谈话：“准备逐步解放你，但群众有气，你先当事务员把伙食管起来，”我意识到这是阴谋，那个时代的伙食我不能搞，造反派的口味稍不合意，会被诬为“报复”或“破坏”，特别是那个造反派头头习以为常地到厨房明拿暗偷，同样一份菜，借口“吃不完”，只给半份菜钱，谁也不敢管，我何必自讨苦吃。我断然拒绝，仍然烧开水。同年10月，地革委书面通知，调我担任修建凤凰电站筹建组长，从此获得“解放。”

## 二、奋起抗争

一九六七年春从成都开会回来，月华电厂的造反组织对我进行批判。看见造反派用纸糊“尖尖帽”，写上自己的名字，打上三个红×，心里怕得要死，暗想今后如何见人？当被推上会场，强戴上“尖尖帽”，似乎全身都在发抖。回供电所后，戴“尖尖帽”的次数更多了，逐渐地不如在月华时紧张了，特别是街上每天都有数不清的“高帽子”游街，也就见惯不惊了。凡开批斗会，已具有戴“尖尖帽”，“坐喷气式”，挨打的思想准备。在不堪忍受日益残酷的批斗时，曾产生过自杀的念头，但西昌县手管局局长王来云同志在供电所侧的酿造厂上吊自杀后，高音喇叭反复传来“王来云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叛党行为”的吼叫，我开始清醒，打消自杀念头，坚信自己，有无问题自己最清楚，比任何旁人都清楚，一切诬蔑捏造都不是事实，怕什么？死了是白死，反而说是畏罪，是叛党，留下说不清的冤屈。

还有以下几件事，无形中激励我的斗志，并奋起抗争。

在月华电厂接受批判时，命任克秀、王永泰和我三人劳动，我暗自落泪。王永泰同志不愧是历经战火硝烟的战斗英雄，心情坦然，劝慰我说：“不要怕批判，要相信事实，相信党”；“咱们都是劳动人民出身，难道还怕劳动？毛主席教导我们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劳动并非丑事”。王永泰同志的关怀和坦诚，对我鼓舞很大，心灵得到宽慰，放下了架子。对我以后在供电所长期被“监督劳动”，尽管内心反感，但从未偷懒，有无“群专大军”监督，我都自觉老实挑砖24匹。

有一次参加水电局的批斗会，造反派叫我们下跪，没有

人动，先从站在第一名的机电科副科长江治成同志起，按他下跪，江说：“毛主席最反对封建迷信，我不敢跪，怕违反毛主席最高指示”。造反派被堵得哑口无言，谁敢冒违反毛主席最高指示的风险来强迫下跪呢？这次会，我们都沾了江治成的光，都没有跪。

一九六八年，西昌驻军支左办公室把各单位未获造反派“谅解”的干部集中在海滨招待所学习，同组有位生资站的张经理，炮兵转业干部，敢讲真话。他在小组会上说：“我的小孩一会儿又跑进来喊，‘爸爸快出来看戴‘尖尖帽’游街的又来了’，我说，有啥看头？这就是当干部的下场。”说到有些干部站到造反派一边斗干部时，他非常气愤地说：“哪里有黄世仁，哪里就有穆仁智，历来如此。”我们都赞赏他直言，戏称他“炮筒子”，大家问他“不怕挨整吗？”他说：“这样的干部我早就不想当了”。

这些事例，启发我自我保护，以及被迫奋起抗争的意识和勇气。有位军代表，一天和我个别谈话：“毛主席说，有反必肃，有错必揪，你有错误，群众应该揪斗你嘛”。我和他争辩：“毛主席说的是有反必肃，如肃反发现错误，应该纠正，不是揪当权派啊”，他说：“肃反有错要纠正，当权派有错也要揪斗”。有一次和我谈话说：“你的罪行应该从严惩处，现在对你宽大，从轻处理”。我问他：“我有哪些罪行？根据哪条规定，该给什么样的严惩？现在又是根据哪条规定，给我什么样的从轻处理？请说明白”。他半晌无言以对，最后说：“看来你硬是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

每次批斗会，我都坚持实事求是，尽管戴上“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帽子，或打得口鼻流血，对诬陷，决不

屈服。我坚信并反复背诵中央领导同志的话：“是好人，想打也打不倒；是坏人，要保也保不住”。一九六九年某革命领导干部主持的批斗会上，他无中生有地造谣说：“解放前，你在碾米厂，头戴博士帽，腰插双枪，打了国民党特务陈家邦。”意思是说，特务陈家邦你都敢打，必然有比陈家邦更大的反动身份。我据实据理驳斥，从小至今家庭贫穷，买不起博士帽，从未戴过博士帽。根本未玩过枪，更无双枪。一小学同学叫陈家邦，但无来往，不知他住何处，作何工作，打陈家邦之说纯系谎言。并举出碾米厂及街邻的十几人作证。这位革命领导干部在桌上猛击一掌，大声嚎叫：“证明材料只能由组织取证，你无权列举”。我愤急之下，不顾一切，走过去也在桌上拍一掌，大吼：“难道只准你们诬蔑陷害，就不许受害人据实申辩么”！其实我是逼上梁山啊。这位领导干部虚张声势地说：“大家都看见了，刘宗梁的嚣张气焰，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散会。”从此再没有开过对我的批斗会。

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〇年，我不断向地革委、军分区、省革委、省军区书面申诉。一次，还向地革委口头申诉，地革委某领导因感冒在家休息，我找到家中，他未听完我的申诉，就说：“你的问题应向‘清队’办公室反映”。我非常反感，心想你在县上也被诬蔑这样那样的问题，受过屈辱，结果来地革委就忘了同样受害的群众，轻信对下级干部莫须有的诬陷，当面和他争吵，“‘清队办公室’管清理阶级队伍，清查‘几种人’，我是哪一种？我既不是‘几种人’，为何要由‘清队办公室’解决我的问题？”他无言以对，只说病了需要休息。我又找到地革委副主任苗毓霖同志，他是我入党

时的支部组织委员，对我有一定了解。他听完我申诉后带我到政工组，当面交代：“一、刘宗梁是地革委管的干部，要打倒可以，但须报材料经地革委批准；二、看病不需请假，未经地革委批准，不得限制其行动自由。”从此，我可以自由出入厂门，到医院看病，治疗尿血和挨打罚跪的伤痕，止住了脚膝的化脓和流黄水，但尿血已成顽症。

一九七〇年，地革委调我主持德昌凤凰电站修建工作，军代表在会上说：“刘宗梁的问题，我们已查到一些线索，需进一步查证，地革委突然把他调走，一再反映，地革委不同意，只好服从。”我明白这是一种内心极不情愿而装腔作势的表白，我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醒目之处，大意是：个别人别有用心，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对我诬蔑陷害，军代表不了解情况，受人欺骗蒙蔽，供电所发生许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我离开供电所，革命群众仍可拿出事实和证据，我随时都可以回来接受批判。这张告别大字报，是对军代表工作的意见和批评，也是对不同意我调走的公开表态。但只能写到如此，当时许多事例表明，向军代表提意见，会被上纲为“攻击长城”定为现行反革命的。

一九七二年，地革委在海滨招待所召开工业“抓革命、促生产”工作会议。供电所某领导在小组讨论时离开议题说：“运动中说你是国民党、特务，我非常惊异”。显然是向与会者散布我的“反动”身份，企图继续把我搞臭。我可以说是怒发冲冠，奋起还击。来而不往非礼也。我说：“是阎锡山的‘铁军骨干’，国民党的兵痞流氓介绍和批准我加入国民党和特务的，现在倒是该由你交代何时，何地、如何介绍和批准的过程，以便澄清事实”。会议领导同志劝阻了我

们两人的争吵。

### 三、亮相和表演

“文化大革命”运动虽然是我们党的重大失误，但各种人物既有本来面目的亮相，也有回味无穷的尽情表演，留下难忘的记忆。

（一）一九六六年，革命群众办墙报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剪一毛主席头像作刊头，在头部放射状的贴了一些金黄纸条，本意表示毛泽东思想闪金光。造反派则说用许多金箍棒打毛主席的头，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事件”。

（二）“文革”初期，单位的一些小孩组建“红小兵”，我的两个小孩分别为十二岁和十岁，参加了“红小兵”，戴上红袖套，扛上红旗，以紧跟毛主席闹革命而自豪。几天后，突然把两个孩子的袖套收了，骂他们是黑帮子女，还被追打。两个孩子心灵受到极大打击，在家中非常苦闷。我爱人从街上买回两个背夹子，姐弟俩每天早晨就上北山捞松针，开始背回 15 斤和 20 斤，近一年，锻炼到背 30 斤和 50 斤。幼小的儿童，遭受株连，确实不堪回首。

（三）我被关黑屋中，造反派把我的两个孩子叫去训话：“你们愿不愿跟毛主席干革命？”愿意”。那就把你父亲解放前干的坏事揭发出来，”我们不知道，”你们还和父亲划不清界限，就是不革命。”我是一九五三年结婚，两个孩子分别出生于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六年，怎会知道解放前的事，古今中外，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么？

（四）一九六七年批判当权派，从专区水电局副局长调去任冕宁县长的汤国栋同志，检查向上爬的资产阶级思想，

造反派追问：“你已当了县长，还不满足吗？”汤答：“资产阶级思想是没有止境的，当了县长还想当专员。”水电局造反派大加赞赏：“检讨深刻，触及了灵魂。”召集水电系统各单位当权派学习汤国栋同志“亮私不怕丑，赢得群众谅解。”我却并不以为然，深信这不是汤国栋同志的真心话，而是用他的机灵巧妙地嘲弄造反派。

（五）解放前，我曾在姜坡电厂等单位作过管伙食的事务工作，旧社会有人曾把此种工作叫做特务长，（新社会称为事务长）据此，文革中诬我为“特务”，而且还是“特务的长”。

（六）供电所业务室一位搞电费工作的干部，是起义军官。单位一台交流收音机摆放在业务室。“清队”中造反派要他交代与国民党的联系，这位干部反复说没有联系，“你们办公室有收音机，可以收听敌台广播，肯定联系过，”我不敢收敌台。”一阵触及灵魂更触及皮肉的拳脚之后，被迫“坦白”“收听过；收过几次？”收过一次。”听到什么？”蒋介石说要反攻大陆。”还收听过几次？不敢收第二次。”又是一阵拳脚；想起来了，收过两次。”又听到什么？”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如此反复；收听过五、六次。”“蒋介石反攻大陆，你怎么办？”我去迎接他。”你一个人去吗？”我组织人去。”组织哪些人？”穷追之下，经过多次反复，共交出其伯伯、叔叔、孀孀、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十多人；“如何迎接？”到龙眼井（现市三中）河坝去等。”事有凑巧，这位干部无意中捡回一只发电报用的电键回家给小孩子作玩具，抄家被搜出，成为特务发电报的“铁证”。供电所革委会因大字报贴出“挖出一个隐藏近二十

年的特务大案”的喜讯，向地革委报喜。还把这个“隐藏特务”用汽车押去泸沽和大营示众，介绍“挖出特务”的“经验”。

（七）供电所革委会成立后不久，革命领导干部提浆糊桶，造反派结合的副主任刷浆糊、委员在供电所大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醒目标题是：“《坚决打倒国民党、特务刘宗梁的紧急报告》”。大意是：“一九二七年，大地一声春雷，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了。但在这同时，降生了一个妖魔，就是国民党，特务刘宗梁。这个妖魔，天生的仇恨中国革命”。

革委会规定我们几人每日三餐都要挂写有“反动”身份的黑牌，手抱稻草人，敲锣在厂门口肃立“请罪”示众。有人主张向军管组和革委会提出来，我不同意向他们乞求。我们虽然遭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和痛苦，却正好揭露他们的暴行。不出所料，每天来供电所侧豆腐房买豆腐的人群，端详了我们后，多数人叹息“什么时候了，还在这样搞！”至今不少人和我开玩笑说：“我早就认识你了，是供电所的当权派，天天在厂门口敲锣，硬是整惨了”。

#### 四、平反

一九七六年十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的结束，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引下，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共凉山州委农工部，组织部以凉委农〔79〕字第53号和凉组函〔79〕字第968号联合发出《关于对刘宗梁同志平反通知》；对在“文革”中给我的不实之词和扣上的政治帽子全部推倒，恢复政治名誉。驱散阴霾，大地终于迎来充

满阳光的春天。历史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 抓“走资派”曹振祥

李凯恩

曹振祥，山西临县人，1949年随贺龙、李井泉率领的18兵团南下入川解放西昌，60年代初至1966年5月，任西昌县委书记，因工作需要，“文革”即将开始时，调到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任职。“文革”开始后，在打倒“走资派”、“揪出曹振祥”的大字报与口号声中，西昌造反组织指派了几名既能办事，又会说话且对曹振祥很熟悉的人员开了介绍信，借足出差费，乘火车直奔北京抓“走资派”曹振祥。

北京市政府接待室的人员看过介绍信，听了来人说明来意后，热情接待，安排好住、吃。过了两天接待室人员答复：曹振祥出差不在京城。来人问啥时回来。回答：“说不准。”也不告诉曹的办公室和住址，不准他们在办公地方走串，进出市府大门卫兵还要严格查问。一连等了好几天连一点消息都没有。二次找到接待人员，答复：“还没回来，再等几天。”又等了十多天还是没得结果，他们感到事情蹊跷，几个人再三研究，想出了两个办法：一是大造舆论，上街张贴“揪出西昌最大‘走资派’曹振祥”的大字报，并揭发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行”；二是在上下班时间注意观察，一经发现当场抓住，揪回西昌。

一天中午，造反人员正在市政府大门外张贴西昌革命群

众强烈要求北京市政府交出“走资派”曹振祥的大字报时，背后有一40多岁、瘦高个子的干部也在看揪曹振祥的大字报，此人一言不发，看了下正在贴大字报人的面容，头都不抬，快步走开了。造反人员贴完大字报便问一个看大字报的青年人认不认识曹振祥，青年人回答：“刚才曹振祥还在你们背后看大字报哪！”他们如梦初醒，姓曹的要么根本就没出差，要么出差已回到北京。

有一次他们几个造反人员从接待室出来，天在下雨，迎面走来一个打黑伞的人，低着头擦肩而过。他们上前问卫兵看到曹振祥没有，卫兵惊奇地说：“刚才与你们迎面走过的那个打黑伞的人就是曹振祥呀！”几个捶胸顿足，错过机会，但证实了曹在这里天天上班，就在眼皮底下。

他们几个人发誓，不能再让曹溜走。天天在上下班的时候分工提前站在大门外两边，目不转睛，盯着人们的进出。有一次下班的人都走完了，他们几个还在等，卫兵告诉他们：“不要再等了，有个头戴鸭舌帽，脸上蒙着大口罩的高个子，不就是你们要抓的曹振祥吗？刚才出大门，你们这样多的人为啥不抓住他。”他们说“我们确实没有看见”。卫兵叹了一口气：“你们几双眼睛在看啥。”他们几个互相埋怨一阵，也无济于事。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没有抓到曹振祥。有的说另想办法，总要把他弄到手；有的说算了，北京不同西昌，没人支持我们；有的又说空手回去不好说……，反正出差费还没花完，几个人都是第一次来首都，很想在京多耍几天。先后游览了故宫、天坛、动物园、颐和园、十三陵、八达岭等名胜古迹风景区，无可奈何赤手空拳返回西昌。造反组织的头头

听了他们的汇报，心里很不满意，但口头不好批评，勤务组的一个主要头目说了一句：“这次没有把姓曹的揪转来，不要紧嘛！运动才开始，下次再去抓他也不晚。”从此，在县委大院和街上再看不到曹振祥的大字报，高音喇叭里也听不到“打倒曹振祥”的口号了。

